

寧河文史資料

李新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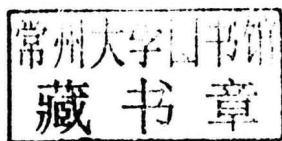
第九輯

政协天津市宁河县委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宁河文史资料

第九辑



政协天津市宁河县委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2010年10月

宁河文史资料

第九辑

*

政协天津市宁河县委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开本 850x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2 万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津内部资料性准印证图字第 10107 号

内部资料

《宁河文史资料》（第九辑）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孙会元

副主任：李振亮 李志军 李敬霞

董恩兴 卞长生

主 编：孙万义

政协宁河县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

主 任：孙万义

副主任：于云和 卞文华 杨连起

委 员：杨国奎 刘旭清 王桂义

陈月桂 张景森 王庆华

郑顺和 戴雁军 赵淑新

邢丽丽

目 录

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与王照	孙万义 (1)
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	周敏之 (5)
晚清骁将——直隶提督李长乐	陈 刚 (17)
驰名海内外的倭虚大师	孙万义 (26)
张大千衣钵传人——孙云生先生	孙万义 (34)
武宏在蓟运河畔的战斗	孙万义 (41)
和平列车	杨 朔 (65)
英雄火车司机李国珩	孙万义 (76)
与美军鏖战的那一天	翟殿臣 (84)
解放战争时期的四例战事	魏永成 (90)
财政金融学家崔敬伯	高殿清 (100)
不落的银星——卢碧云	王桂义 (110)
科技先锋——记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之卓	王桂义 (116)
医学伦理学专家——张鸿铸	郭景兴 王桂义 (150)
我的人生之路	张鸿铸 (153)
唐紫园传略	高殿清 (162)
宁河民情风俗	孙万义 (170)

宁河镇寻古	杨国奎	(196)
宁河县村居村落形成特色	于云和	(202)
康乾盛世长寿之乡——宁河镇	高殿清	(208)
中国北方木版年画发祥地——宁河县丰台镇	孙万义 王 艳	(214)
宁河古典诗词赏析	孙万义 蔺志茹	(219)
丰台赋	杨国奎	(229)
林立古镇的丰台商号	齐志乐	(233)
民国年间的丰台私塾	齐志乐	(248)
李公祠与芦台二小	陈 刚	(250)
浙闽总督刘兆麟墓志铭	杨国奎	(252)
漫谈天津七十二沽	刘钟禄	(260)
追寻《逝去的武林》	孙雪涛	(265)
宁河县境内的农场	孙万义 谷秋生	(273)
开国大典阅兵式亲历士兵——卞宝章	卞长生	(290)
我所知道的县委书记杨志恒	李仲三	(298)
宁河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褚庄党支部创建始末	杨云河	(304)
河北省第三荣军学校始末	高殿清	(308)
小村忆旧——民国初期田庄坨村剪影	胡艺生	(313)
宁艾路畔话往昔	赵约公	(323)
关于“瓜菜代”的回忆	杨国奎	(331)
关于“卫星河”的回忆	杨国荣	(336)
怀念我的父亲毕洪志	毕井华	(340)

煤河的兴衰	孙万义 (345)
蓟运河辽代漕运史	高殿清 (351)
嘉庆六年特大水患淹宁河城	高殿清 (360)
中国第一条商运铁路——唐芦铁路	高殿清 (365)
刘仁恭父子之战	杨国奎 (373)
芦台天齐庙舍粥	李佑生 (375)
纪晓岚为艾孝子写传	高殿清 (381)
效节军的覆灭	杨国奎 (384)
胡三省错注“芦台军”	高殿清 (386)
杜立德轶闻三则	陈庆发 (388)
宁河县飞地——南青坨	王桂义 (394)
民国时期丰台镇最后一次赈济活动	王桂义 (400)
“还乡团”在朱头淀制造的一起惨案	李仲三 (404)
丰台镇遭日军轰炸始末	王桂义 (407)
于潮庄惨案	王桂义 (409)
军统特务陈恭澍的传奇人生	高殿清 (412)
齐燮元被逐出华北政府内幕	高殿清 (433)
战后肃奸及齐燮元之死	高殿清 (436)
张志潭与齐燮元	高殿清 (443)
宁河县医院院志《宁静致远·医者仁心》著成出版	陈晓旭 (446)
文史资料与地方志的关系	孙雪涛 (448)

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与王照

孙万义

语言、文字的统一从来都是民族统一的重要象征。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不一,但是以北方方言为标准的普通话最终成为人们相互沟通的桥梁。而普通话的推广,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中国文字虽然在秦代就实行了统一,但是语言一直未能统一,给人们相互交流带来了许多障碍。特别是随着近代列强的入侵,建立租界,导致中国母语的进一步分裂。

中国首创拼音文字的人是福建同安县人卢赣章。他早年学过英文,后来帮助厦门传教的英国教士马约翰翻译《英华字典》,对英国文字与语言的一致,颇有感触。光绪初年,漳州、厦门一带的教会利用罗马字创行一种“话音字”来拼写土音,以此刊行《圣经》。但是这种“话音字”还存在许多问题,很难推广。当时,卢赣章就想创造一种大家容易接受的拼音文字来,于是他在“话音字”基础上进行了增改,悉心研究十几年,于光绪十七年(1892年)选定55个符号,组成一组罗马字式的字母,并著成《中国第一快节音新字》,此后在漳厦一带风行。时逢朝廷提倡变法维新,1898年,他的同乡京官、安溪人林谔存上奏光绪帝采用这种新字以便普及教育。光绪因此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这本著作,详加研究再定。不久发生“戊戌变法”,此事被搁置下来。1905年卢赣章亲自带着所著切音字书到北京,缴外务部进呈,结果却被学部驳回,从此未有结果。在封建时代,推广“音字”普及教育,还勉强可以接受;而主张用罗马式字母作为新字代替原有的汉字,自然会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

中国最初提出以拼音字母拼写官话(北京话)统一汉语的人是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宁河县人)王照。王照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曾中举人、进士,任礼部主事。在芦台创小学堂,为全国首创州县地方学校(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一小学)。王照在“戊戌变法”中一直主张教育救国,1899年变法失败后,与梁启超一同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专心研究片假名文字。1900年,王照潜回天津,由于不能公开活动,就暗自研究编辑了官话合声字母,这是我国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目的是用字母拼写官话来统一汉语。其方法是摹仿日本片假名采取汉字中的一部分作为字母来拼写官话。共有声母50个叫字母,外加韵母12个名为喉音。1903年,王照以学生王璞的名义,在北京创办官话合声字母义塾,极力进行推广。当时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两个人的赞同,首先是国学大师吴汝伦。他刚从日本考察归来,有感于日本用片假名统一国语的经验,明确提出以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统一国语。其次为教育家劳乃宣,主张用王照的字母为新字,并于王照50字母12韵母外加注音、吴音、闽广音。增为116个字母20韵,定名为简字,迭请光绪皇帝和学部,但始终未能通过。不久,宣统皇帝继位,劳乃宣当上了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他联合资政院议员江谦、严复等列议案通过,再奏学部施行。经过反复磋商,1911年,北京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正式通过“国语统一办法案”。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了。

民国改元以后,大家开始重视国语统一。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教育部根据此案于1913年2月在北京召集读音统一会。代表的资格很严格,要精通音韵、文字学、外语和方言。由教育部邀请若干人,各省行政长官选派代表2人,蒙、藏、华侨代表各1人。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选举国民党元老、教育家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实际上,这是一个临时工作组织。第一步,审定国音,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共审定了7000余字的国音;

第二步,要审定音素,采定字母。当时会员们纷纷发表字母采定意见,大约分为两派:王照及浙江代表汪怡等主张采用汉字偏旁为字母;江苏代表杨曾诰等主张以罗马字母为字母。由于互相之间相持不下,马裕藻、朱希祖等人综合几派意见,提议审定字音暂时使用,这样才算正式通过。这些注音字母采自古文籀篆的笔画,声母24个,韵母12个,介母3个。

读音统一会议闭幕后,因为教育当局换了人,提案一直未能执行。过了一年,在京的委员王璞组织了读音统一期成会,迭请教育部颁布注音字母。但教育部推脱正在整理。1915年,王璞等人又以读音统一期成会的名义,请求在北京创办注音传习所。教育部予以批准,但没有正式颁布。不久,袁世凯复辟失败,新文化运动爆发。当时在提倡文学革命外,同时也有汉字改革的主张。1917年,蔡元培等成立了国语研究会,旨在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部采用。1918年,会员激增至1500人,并致力推广注音字母。其中吴敬恒编成《国音字典》,影响力较大。不久,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也响应国语研究会主张,并请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将注音字母在学校中推行。当年10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随后又组织国语统一筹备会,预备讨论修正。此后,对注音字母尚有不少修改,特别对注音字母的次序进行了修改。1919年,教育部重新公布了注音字母次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国语统一有两种主张:其一,张士一提出的根本改造国音及注音字母,以北平话为标准语,平音为标准音;其二,钱玄同、赵元任等提出的用罗马字母为字母,拼成国音以代替注音字母。最后综合了二家的意见。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应国语统一会之请,公布国音罗马字母,即以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对照。不久,国民政府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在部内设立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仍聘吴敬恒为主席,以国语统一运动的健将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等为常务委员。193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年会。会上应吴敬恒的提议,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

号”，并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此后，教育部内设立注音符号推广委员会，编制注音符号传习小册作为推广和普及的工具。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可为正确国语的标准。至此国语运动告一段落。

戊戌政变后 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

周敏之

戊戌政变后,王照逃亡日本,游说日本政要,谋救光绪帝,并登报撰文反对慈禧的废立阴谋。王照谋救光绪帝的活动,与封建时代单纯的忠君行为不同,其目的是想保住光绪这面变法大旗,继续同封建守旧势力作斗争,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照(1859~1933),字小航,直隶宁河(现属天津市)人,是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因上书言事被黜官而名噪一时,被称之为“救亡之一要人,本与康有为齐名”。(注:陈光尧:《王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人们对此较为熟悉,并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他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不大提及,更无专文讨论。事实上,王氏的这一活动,是他变法的继续,倘不加研究,就很难反映出他变法活动的全貌,对他与康、梁的关系,也很难有进一步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他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的活动作一论述。舛误之处,请指正。

一、游说日本政要

1898年9月21日(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并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持续103天的新政至

此以失败告终。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逃往日本。

王、康、梁等人逃往日本,除政治避难外,另一主要目的就是向日本求救,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使光绪恢复帝位。

王、康、梁等维新派对日本抱有好感,与日本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在外交关系上,他们都主张联日政策,甚至有意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以辅佐中国推行新政。政变发生后,又多赖日本援救,且依靠英、日等国力量营救光绪皇帝,本也是维新人士的应变措施。政变当天,梁启超、谭嗣同私访李提摩太,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商讨决定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有美国国籍,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李提摩太则亲自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设法去保护皇帝”。(注:《中国的维新运动》,林树惠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5页。)因此,他们逃亡日本后,希冀借助日本的力量营救光绪,乃为顺理成章之事。

此时,日本政治环境和政界人士态度对王、康、梁等实施这一计划也十分有利。

日本大隈政府在外交上,主张“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期待中国能早日解脱封建政治体制,成为民主国家,因此,大隈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维新派支持态度。虽然另有其他目的,但却与中国维新派学习西方文明和联英日拒俄等主张合拍。政变发生后,大隈多次与清政府总理衙门和庆亲王交涉,积极营救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被救往日本就是出自他的命令。日本社会舆论对中国维新派亦深表同情。

日本朝野的此种态度,使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大感有望,于是他们四处游说,接连致书伊藤博文、驻华公使林权助、日本总理兼外务大臣大隈和日本外务省官员,并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磨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相救。(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大陆杂志》第81期第6期。转引自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6期,第91页。)1899年2月13日,在得知近卫笃磨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后,康有为和王照特地前去拜访,为劝说日本政府帮助光绪再次进行努力。此次会谈,从《近卫笃磨日记》来看,王照是主要发言人。他主要从国际关系立论,指出保护光绪、助光绪复政于日本有利。他分析道:“戊午(西历千八百五十八年),敝国割地与露之约(贵国桦太之失,实此事之波及也),丙申与露之约,去岁割旅顺,皆敝国臣民所不及料者也。今以后出入意外之事恐更大矣。”清政府之所以不能抵御俄国的侵略,使日本在华利益连带受损,按王氏的看法,是因为清政府疑忌日本而依恃俄国的缘故。他指出,清政府这种“联俄拒日”的政策是万不会改变的,目前因畏惧日英兵力,虽“不敢显然联俄相抗”,而“其密商之事已多矣”。他说,要避免此种祸端,“非我皇帝不能挽回”。他请求近卫笃磨对西太后、荣禄等施加压力,保护光绪。他说:“太后、荣禄畏贵国如虎。公爵若驾临,彼等猜忌畏惧,止有好言迎承,决不敢冲突。若公爵如以大义责荣禄如曰:闻光绪大皇帝英明,是东亚之福,日本臣民无不庆幸。贵大臣总当顺从皇帝之意,倘皇帝忧愁成疾,实大臣罪过。如此数言,则彼辈自不敢萌弑害之心。”

王氏此番言论,析理入微,颇具说服力,但是否为近卫笃磨所接受,最终仍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非王氏一番言辞所能打动。同以往一样,王照和康有为此次游说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二、同康、梁分道扬镳

虽然王照与康、梁有“共一恫”之处境,在援救光绪问题上也有其一致之处,并为之共同奋斗过,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并没有因此消除。相反,随着情况变化,却日渐凸显,最终演成冲突。

王照的策略比较单一,就是通过游说日本政府,对慈禧施加外交压力,迫其还政于光绪。他主张对慈禧言辞要内外有别,公开场合,不宜过分刺激;更反对武力夺权。这实际上是他戊戌变法时期“调和帝后”策略之延伸。

康有为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不反对和平劝说,上述他所作的努力,大都如此。他在致李提摩太的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信中说:“夫西后之篡废,非欲为帝也,但为群小所牵,迫为之耳。……若有大国剴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代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注: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第159~163页。)这与王照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继续贯彻其武装夺权方针,或借师,或谋划国内兴师勤王。并且随着时局的演变,这种指导思想越来越占上风。

王照与康、梁之间的矛盾,终因康、梁公开发表光绪密诏和谭嗣同血书而激化。

戊戌九月下旬,康有为在日本公开发表《奉诏求救文》,对光绪极为赞扬,对慈禧、荣禄痛加诋毁,列举慈禧谋害慈安太后、废君篡位等十大罪状。他在文中还自称密受衣带诏,负有向外国求救之责。为了证实自己并非谎言,他特将杨锐、林旭分别带出的光绪两封密诏,谭嗣同分别致康、梁的两封绝笔信,以及咸丰皇帝给慈安太后的密诏公布于世。

康有为的求救文和这些密诏、书信,无异是讨伐慈禧的檄文。康有为作如此激烈之举动,个中原因,从文章本身可见端倪:“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哉?……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嬴,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注: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3页。)由于对慈禧将行废立、谋害光绪作如此肯定之判断,大有鱼死网破之意。此为原因之一。

另一原因与康有为打算兴师勤王有关。据亲历者日人宗方小太郎记载:

与柏原同至加货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物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洋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绝不轻易出兵,但如时

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实力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相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注: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康有为显然虚张声势。不过,他欲兴师勤王并对此抱有信心却是不假。既然有此计划又有此信心,自然对慈禧持强硬态度。

康有为此举,与王照“调和帝后”方针相左,引起王氏强烈不满,此从他与康有为发生冲突后向日人犬养毅揭发康、梁作伪一事便可看出。在与犬养毅笔谈中,他首先揭露康有为篡改密诏之真相:

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

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祇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注: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

王氏指责康有为作伪诏,当然不是为此事本身缘故,他主要是担心触怒慈禧,导致光绪与慈禧的矛盾不得化解,他与犬养毅笔谈中说: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和。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四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刚潜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注: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2页。)

对于康有为所公布的谭嗣同两封绝笔信,王亦认为是伪作:

任公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隔一纸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注：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小航文存》卷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第20页。）

王照向日本人士揭发康、梁作伪，目的仍在“和两宫”，故在《笔谈》末尾云：

今□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以后近卫公赴北京，亦必真知皇上与太后之情，方可调和，勿专听一二人之私言为幸。（注：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

从王照的语气来看，似乎他看过密诏原件，了解真相。黄彰健先生等经过研究，证实王氏所说不诬。

康有为自称奉诏求救，目的是为抬高身价。可能王照在向犬养毅揭发以前，曾对康氏此举表示过异议。康有为惟恐泄漏，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便对王氏多加压制。据王氏自诉：

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及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与监狱无异矣。

王照性情刚烈，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便酿成一场公开冲突。陈少白于其著作《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戊戌年在日本与康有为会晤之经过对此事有云：

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了，同时厅内还有两个人，由梁启超介绍，一个是直隶人王照，同是来避难的。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边，就对我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由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觉得不妙，就忿忿地对梁铁军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罗唆罢！”梁铁军起来强拉着王照出去，我们就彼此纵谈。（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按语，《戊戌变法》第4